



带一门学问回中国

盗火者严复

DAI YIMEN XUEWEN HUI ZHONGGUO
DAOHUOZHE YANFU

李新丰 著



他被推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他把进化论带到中国，
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世界观。

天津人民出版社



带一门学问回中国

盗火者严复

DAI YIMEN XUEWEN HUI ZHONGGUO
DAOHUOZHE YANFU

李新宇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带一门学问回中国. 盗火者严复/ 李新宇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201-06627-1

I. ①带… II. ①李…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6263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1 插页

字数: 340 千字

定价: 3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留学:面对另一个世界	(1)
一、从福州启程	(1)
二、最初的留学生	(6)
三、知遇郭嵩焘	(11)
四、对“西学”的认识和接纳	(22)
第二章 海军教习的悲欢	(27)
一、回国之后	(27)
二、任职情况	(29)
三、仕途不畅之谜	(32)
四、难圆的科举梦	(41)
五、严复与李鸿章	(43)
六、甲午战争中的海军教习	(47)
第三章 言论(上):警世雄文	(58)
一、战争留下的疑问	(58)
二、认识千古未有之变局	(65)
三、寻求富强之路	(69)
四、批判专制传统	(77)
五、认识“政教之非”	(80)
六、帝国黄昏“醒者”谱系里的严复	(85)
第四章 言论(下):维新的另一路径	(91)
一、独树一帜的《国闻报》	(91)
二、严复与“康党”	(94)
三、《拟上皇帝书》	(101)
四、“未及用”的“新党”?	(107)
五、批判“中体西用”	(111)

第五章 译述(上):天演论旋风	(118)
一、走向翻译	(118)
二、“译”与“做”	(119)
三、《天演论》带来了什么	(127)
四、知识界的“天演论旋风”	(133)
第六章 译述(中):自由理念	(137)
一、《原富》:传播西方经济思想	(137)
二、《群己权界论》:试向国人说自由	(148)
三、《法意》:介绍西方法理	(159)
第七章 译述(下):社会政治及其他	(174)
一、“群学”中的“修齐治平”	(174)
二、为什么翻译《社会通论》	(179)
三、未完成的“名学”译述	(190)
第八章 教育:理念与实践	(194)
一、见解与主张	(194)
二、主持复旦公学	(199)
三、安徽高等学堂监督	(201)
四、从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到北大校长	(208)
第九章 政治舞台上的身影	(215)
一、“中国国会”副会长	(215)
二、革命到来之际	(219)
三、复辟罪魁?	(230)
四、严复与袁世凯	(238)
第十章 盗火者“灭火”之谜	(249)
一、变与不变之间	(249)
二、现实感受与传统拘牵	(256)
三、英国经验与斯宾塞学说	(263)
四、知识:西学与中学的先后	(268)
五、严复和他的朋友们	(272)
后 记	(282)

第一章 留学：面对另一个世界

1877年3月31日，一艘轮船从福州起航，经香港驶往英国。船上有一群中国青年，是大清国派往英国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其中有一位名叫严宗光，就是后来的严复。

这次远洋造就了他，使他后来以自己的笔影响了中国。

不过，对于此时站立船头的严宗光来说，英国将给予他什么，他将从英国带回什么，一切尚属未知。他所知道的，只是他将到英国去学习海军，回来后做一名水师将领。但后来的结果是他没有想到的——他所带回的比他自己和派他去的人所预期的，多了许多。还有一点他更没有想到：他回国后没有成为海军将领，而是以思想影响了一个时代。

一、从福州启程

严复生于咸丰三年旧历十二月初十，也就是公历1854年1月8日。关于严复的生年，传记材料有的写1853年，有的写1854年，原因就在这旧历与公历之差。严复出生时，按旧历还是1853年，按公历却已进入1854年。他是福建侯官人，原名称体乾；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时改名宗光，字又陵；留学归来后改名严复，字几道，后来即以此名流行于世。

无论是面对严体乾还是严宗光，本书的叙述都以严复相称。

严复出生在一个儒医世家，父亲严振先是读书人，又是当地名医，有“严半仙”之称。像当时一般士绅之家一样，父亲希望严复能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所以很小就教他识字读书。按照严复的孙女严停云的说法：“曾祖父国学造诣很深，行医之余，亲自教祖父读书。到了他七岁，才让他进私塾。九岁令回江阴乡进他的胞叔厚甫公的私塾。厚甫公是位举人，为人严肃寡言笑，所教的是《大学》、《中庸》等等。教授法不佳，祖父读了没有兴趣。因此，在他十一岁那一年，曾祖父又命令回福州，请了一位宿儒黄宗彝先生来专门教导他。”^①

^① 严停云：《吾祖严复的一生》，《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文集》，1993年。



黄先生名少岩，“汉学与宋学并重”，在当地颇负盛名，但他的教学环境很差：教室设在一个戏班的楼上，戏班经常要在夜间彩排，锣鼓喧天，害得小严复读书时常常要用两手捂住耳朵。先生倒是个灵活的人，管不了戏班，就调整自己与弟子的作息时间，楼下锣鼓一响，严复就倒头睡觉，到下半夜，戏班排练结束，再起来学习。小严复常常是半夜起床做功课，一直做到天亮。而且，老夫子有腰酸背痛的毛病，需要以鸦片麻醉镇痛，“常常一管烟枪在手，歪斜在床榻上；一面吞云吐雾，一面讲故事给学生听。”^①黄少岩很快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接替了他的工作，严复又跟着他的儿子学习了一段时间。

1866年春，严复奉父母之命与当地王姓之女完婚。按照中国计算岁数的传统，当时的严复号称十四岁，而事实上刚满12周岁。

同年8月，严复的父亲因抢救霍乱病人而染病身亡。

父亲的去世使严复经济上失掉了支撑。他只好另寻出路，放弃通过科举入仕的打算，转而报考无需花钱的洋学堂。恰巧就在这一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开始招生。

福州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校址在马尾，所以又称马尾船政学堂。它是大清帝国的第一所海军学校。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两个部分，前学堂是制造专业，是学造船的；后学堂是驾驶专业，学军舰的使用，才算真正的海军专业。

在以科举为出身正途的时代，这种新式学校对读书人并没有吸引力，所以考生多是贫寒子弟和受到外国影响的商家子弟。为了吸引考生，学堂提供了比较优厚的条件。以下是左宗棠亲自撰写的《求是堂艺局章程》：

一、各子弟到局学习后，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日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每日晨起后，夜眠前，听教习洋员训课，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

二、各子弟到局后，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患病较重者，监督验其病果沉重，送回本家调理；病痊愈后即行销假。

三、各子弟饭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贍其家，以昭体恤。

四、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

^① 严停云：《吾祖严复的一生》，《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文集》，1993年。

五、子弟入局肄习，总以五年为限。于入局时，取其父兄及本人甘结，限内不得告请长假，不得改习别业，以取专精。

六、艺局内宜拣派明干正绅，常川住局稽察师徒勤惰，亦便剽学艺事以扩见闻。其委绅等应由总理船政大臣遴选给委。

七、各子弟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唯学习监工、船主等事，非资性颖敏人不能。其有由文职、文生入局者，亦未便概保武职，应准照军功人员例议奖。

八、各子弟之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工银数发给，仍特加优擢，以奖异能。^①

对严复而言，这份章程的吸引力在于，上学不仅不要学费，而且衣食住全由官府供给，除此之外，每月还发给四两银子补贴家用。四两银子，在当时能养活八口之家。

但报考并不顺利。当时规定考生需要有人担保。严复的叔父严厚甫是个举人，有很好的资格和声望。严复母子自然要请他作保。但这位“正途”出身的举人老爷却对新学堂没有好感，因而不支持侄子报考，当即回绝了严复母子的请求。无奈之下，严复母子盗用叔父的名义私自填写了保单。叔父知道之后，曾经大发其火，严厉教训严复，在严复母子的苦苦哀求之下，才无奈作罢，使严复得以报考。

然而，严复的考试是顺利的。试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父亲去世不久，家中只有母亲含辛茹苦支撑门户。面对试题，严复思之动情，百感交集，文章写得情文并茂，作为主考的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当时也刚刚失去了母亲，阅读严复的文章，一下子就被深深打动了。于是，在全部考生中，严复名列第一。

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次招生只录取了几十名学生，后来又从香港补招了邓世昌、林国祥等人，前后两学堂相加，总计只有 105 人。这些学生在学习期间病去 6 人，又有 60 多人陆续退学，到 1873 年，只剩 39 名，而最后完成学业的，只有 14 人。他们成为后来北洋水师的栋梁。以下是驾驶专业第一届 33 名学生的名单：

罗丰禄	何心川	蒋超英	刘步蟾	叶伯鋈	方伯谦
林同书	郑文成	林泰曾	李达璋	严宗光	沈有恒
邱宝仁	陈毓淞	林永升	叶祖珪	陈锦荣	黄 煊
许寿山	林承谟	柴卓群	郑溥泉	黄建勋	张 成
林国祥	叶 富	吕 翰	黎家本	邓世昌	李 田

^① 左宗棠：《求是堂艺局章程》，《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 28—29 页。



只要稍微有一点中国近代史知识,就能从中发现一些北洋海军名将的名字,邓世昌、林永升、方伯谦、刘步蟾……都死于那场海战。明白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那场战争对严复的思想和感情冲击多么大。

1867年初,学堂正式开学。课程设置以英国教育为蓝本,设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光学、声学、热学、电磁学、天文学、地质学、航海术等。同时,也要“读经明理”。因为校舍尚未建成,学堂借了城南定光寺的空房作教室。古刹的暮鼓晨钟里,回荡着A、B、C、D的朗朗读书声,真是别有一番意味。严复晚年曾经深情地回忆过那种情景。

刚入学堂时,严复内心充满无奈。但当时的严复不可能意识到,这里将影响他的一生。因为正是在这里,他才受到了广泛的自然科学教育,得以学习英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为后来的出国留学创造了条件。

福州船政学堂的学习生活紧张而安宁。严复不必为自己的衣食操心,也不必为家庭操心,因为家中有学堂每月补贴的四两白银,衣食可以无忧。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优等,不论是月考还是大考,都能拿到奖金。资金力度不小,期中 and 期末考试,成绩一等者可以得到赏银十两。严复把这些奖金也寄回家贴补家用,以减轻母亲的重负,这事引起了沈葆楨的注意,因而对严复更加赏识。在船政学堂求学的日子,是严复非常惬意的时光。

五年之后,1871年5月,严复与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方伯谦等人完成了船政学堂的学业,被派往从海外购来的“建威”号上实习。这段实习时光使严复见识了家乡之外的世界。他们南下厦门、香港、槟榔屿、新加坡,北上直隶湾、辽东半岛,领略了各种不同的风光和习俗。当时的实习严格而有趣,同一航线都要来回走两遍。出航时,军舰由教习亲自驾驶,学员们测量太阳和星座的位置,练习操纵各种仪器,认真填写航海日志。返航时,学员们轮流驾驶,而由教习将学员所做的,一一进行勘对。

一年之后,严复被调到船厂自己制造的“扬武”舰。在这里,严复的学识和专业技术才能得到了英籍教习德勒赛(Command Tracey,亦译托莱西)的高度赞扬。严复跟随英籍舰长德勒赛,驾驶“扬武”号巡视黄海及日本各地。“扬武”号驶抵日本军港长崎、横滨之际,当地万人空巷,争相目睹大清帝国军舰的风采。德勒赛合同期满回国,临行前特地对他说:“几年相处,今将回国,令人惘然。尔已学成毕业,学习之事,不因毕业而终止。此后自学之日方长,如不自满自足,新知无穷。望尔自励自勉。”德勒赛离开后不久,日本在台湾一带滋事。钦差大臣沈葆楨召严复等乘“扬武”号出海巡视,在台湾各海口做了一个多月的勘察和测量。

1876年，严复迎来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其实，早在两年之前，沈葆楨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就提出了派遣海军学员出国留学的设想，并草拟了一份留学章程。但因事而被搁置了起来。后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开始督办北洋海防事宜，上任之后，即深感没有人才可用，但并没有首先培养人才。在他看来，海军是必须办的，开始只能是择要先办。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当然首先要有军舰。1876年夏季，李鸿章在天津与时任大清总税务司负责人的英国人赫德议定，购买英商阿摩士庄厂制造的炮重26吨半炮船两只、炮重38吨炮船两只，第二年交货。李鸿章身边没人能驾驶这些即将到来的炮船，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南洋借人。这时的严复已经于福州船政学堂驾驶专业毕业，并且在“建威”号、“扬武”号兵船实习了五年，有了比较丰富的航行经验。事情又有些凑巧，这个夏天，严复等四人正驾船巡游在渤海湾。于是，李鸿章决定把他们四人留下来，准备接收和驾驶这四只炮船。按照原计划，旧历的七月间第一批炮船即可到达。但据后来李鸿章奏报，第一批两艘炮船是十月初才到达天津的。演试验收完毕之后，这两艘军舰分别命名为“龙骧”号和“虎威”号。

还是这年夏天，李鸿章在烟台应邀参观停泊在那里的英、法、德等国军舰，注意到英国军舰上有日本军官在受训。这件事启发了李鸿章，坚定了派人到外国学习的决心。

为了迅速发展海军，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楨联名奏请，选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学习造船和驾驶技术，计划派员30名。可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没有那么多，学驾驶的名额有空缺，经过协商，在天津的严复等也被批准补额出国学习。

朝廷于1877年1月正式批准这批学生留学欧洲。3月31日，在监督李凤苞的率领之下，严复等一行离开福州，驶往香港。5天后，他们驶上西行的航线，纵贯中国南海，经新加坡，穿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科伦坡穿印度洋，又经红海、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5月7日，他们到达了法国马赛。在这里，留学生分为两支：郑清廉、罗臻禄、李寿田等学习造船专业的留在法国；学习海军的改乘火车前往英国。学习海军的，都是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的同学，他们是：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黄建勋、江懋祉、林启颖、萨镇冰。加上严复，一共12人。

几天之后，李凤苞带领严复等人前往中国使馆，正式拜会驻英公使郭嵩焘。次日，郭嵩焘在使馆宴请李凤苞等。席间讨论了这批学生的学习问题。经安排，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人分别派往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马那杜”号、“学来克柏林”号、“狄芬士”号铁甲舰实习，并获准给予军官伙食和床位；严复等九人参加了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Greenwich Navel College）的入学考试，结果是严复、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六人被驾驶专业录取。未被录取的黄建



勋、江懋祉、林启颖被安排上军舰实习。

严复的留学生活正式开始了。他成了中国最初的官派留欧学生。

二、最初的留学生

严复是最初的官派留欧学生。

说起中国的官派留学,应该从容闳说起。作为最早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他被称为“中国留学第一人”。同时,谈论中国的留学史,更不能不说到容闳,因为他一生最主要的事业,就是促成 120 名幼童赴美留学,他因此而被称做“中国留学生之父”。说起严复的留学,其实也与容闳推动的幼童留美有关。是派幼童留美的事启发了沈葆楨,才有了派员出洋学海军的动议,最后才有了严复等人的留学欧洲。

容闳(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镇(今属珠海市)。幼年家境贫寒无钱读书,只能到澳门英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学堂就读。1841 年又入美国人布朗(Rev. S. R. Brown)主持的玛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1842 年该校迁往香港,容闳又跟随学校到了香港。正是这样的经历,容闳接受的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大不相同,而且最先走上了留学之路。

1846 年冬,布朗因健康原因要归国休假。临行前他向学生宣布:愿意带 3~5 名学生赴美留学。与此同时,他已经与香港基督教会的几名教友谈妥,由他们为学生提供两年的留学经费,并为学生的父母提供赡养费。让布朗没有想到的是,宣布这个消息之后,四十多名中国学生竟然全都默然无声,最后只有容闳、黄胜和黄宽三人表示愿意跟随校长到美国留学。容闳的父母开始也忧心忡忡,是在容闳的说服之下才同意的。之所以如此,其实并不奇怪。当时国人对海外几乎茫然无知,民间广泛流传着有关外国人的种种骇人传说,比如,中国小孩到了海外,要被剥皮,换上狗皮或者猴子皮,然后拿去展览和表演,等等。

容闳等人之所以有勇气,一是因为他们已在洋人的学校里学习多年,知道民间关于洋人虐待孩子或拿孩子做实验的说法实属荒诞不经。二是为了学点新的技艺,以便将来养家糊口。尽管他们知道,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但他们还是决定到美国去。容闳后来回忆说:“予等留美期内,不独经费有着,即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养贍。既惠我身,又及我族,仁人君子之用心,可谓至矣。”^①直到晚年,容闳仍然牢牢记着那些资助他出国留学的人。

1847 年 1 月 4 日,容闳他们乘坐的轮船从黄浦江起航,经过三个多月的航行,于 4 月 12 日到达纽约。容闳、黄胜、黄宽,成了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一年

^① 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11 页。

后，黄胜因病回国。两年后，容闳、黄宽学完了美国中学的全部课程。黄宽接受了香港教会继续资助的条件，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容闳拒绝了这项以必须学医为条件的资助，同时拒绝了孟松学校以毕业后必须做传教士为条件的资助，坚持报考耶鲁大学。他的想法是：“予虽贫，自由所固有。假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①最后，容闳得到了美国一个妇女团体的资助，得以进入耶鲁大学。这是 1850 年。

1854 年，也就是严复出生的那一年，容闳毕业了，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在美国毕业的大学生。此时，容闳已经立下一个志愿：把西方现代学术文明引入中国。关于这个志愿，他后来回忆说：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也。

虽然，持此观念以论人生之苦乐，则其所见亦甚卑，惟怯懦者为之耳。此其人必不足以成伟大之事业，而趋于高尚之境域也。在予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何也？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盖当第四学年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②

这是第一个因为接受西方教育而发现同胞所受的痛苦与压制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因为受了西方教育而决心以教育的方式改变同胞生存现状的中国人。

① 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24 页。

② 同上，第 27—28 页。



他来自一个饱受痛苦与压制的人群，而置身于现代文明之中，故国同胞的可悲处境时时折磨着他，使他努力要有所作为。当他意志消沉的时候，虽然也抱怨自己不该接受文明教育，因为只要不接受文明教育，对千年固有的生存处境就不会有刻骨的痛感。但他知道，这种消极的人生观是卑微的，一个真男儿，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不能为了那种昏睡中的所谓幸福而放弃求知，更不应该放弃改造生存环境的努力。容闳没有选择政治、经济或军事，而是选择了更为基础的层面——教育。

为了这个志愿，容闳谢绝了美国老师、同学和朋友们的挽留，回到了阔别七年的祖国。那时候，从美国到中国，旅途非常漫长。容闳于1854年11月12日启程，经过154天的航行，才于1855年的4月16日回到香港。他首先回家探望母亲，母亲问他：受了如此高等的教育，回来能挣多少钱？容闳回答说：对我来说，受教育不是为了挣钱，但请母亲放心，我能挣到很多钱。

为了适应祖国的环境，容闳不得不重新留起大清国的辫子，脱掉西装穿起长袍马褂，并且重新补习汉语，练习用骈四俪六的文言写信。但是，在大清王朝的官僚体制中，这个世界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却得不到承认，更不会受到重用。他的志向是推动中国的留学事业，选派学生到美国去接受与他同样的教育。可是，如何操作呢？他只能先在香港谋生，盼着有一天能遇到某位高官，从而实现他的梦想。在中国，一切权力归于官府，最终归于皇帝。容闳的理想需要大臣的支持和皇帝的恩准。可是，他怎么走近那些权力拥有者呢？容闳只能等待。

刚回故乡不久，故国就送给他一件让他心惊肉跳的见面礼——1855年6月至8月，容闳目睹了一次大屠杀。因为有民众暴乱，官府不问青红皂白，对当地百姓大开杀戒，一举杀掉了75000多人，一片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象。从美国归来的容闳无法接受这一切。他似乎已经不习惯这样的传统，所以感受异常强烈：“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不独今世纪中无事可与之比拟，即古昔尼禄(Nero)王之残暴，及法国革命时代之惨剧，杀人亦不如是之多。”^①他回忆当时的感受说：从刑场回家，感到浑身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心胸烦闷，食欲全无，夜不能寐。白天所见景象，总是挥之不去。他甚至因此而想参加太平军，去反抗这种残暴的统治，但转念一想，他放弃了以屠杀反抗屠杀的道路，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原定计划，以灌输新知改变这个人群的命运。^②

1856年8月，容闳来到上海。他在上海当过翻译，译过书，经过商，办过茶叶公司……这一切都不容易，但他不愿为了待遇而做有损人格的事。面对朋友的不解，容闳说：“也许我这个人太富于幻想，不切实际，或是太高傲难以发迹。

① 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② 同上，第38页。

但是在紧张的生活中，一个人必须有幻想，才可以使可能的事情成为现实。人到世界上来，不单单是为活着而劳碌。我曾为求学而不得不努力工作，因而就觉得应该使所学到的微薄知识发挥其最大作用，造福全民，而不是仅为自身利益着想。这样三番五次地调换职业，只是为了试试看我究竟能干什么……”在一般中国人看来，他的确有点不实际。中国的成功人士都是善于适应环境的，而容闳不是，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已与传统不同。

1860年11月，容闳考察了太平天国。他与洪仁玕早在四年前就在香港相识，而且相约在南京相见。但是，当洪仁玕邀请他“共举大业”时，容闳的态度却极不热情。洪仁玕以加官晋爵相诱，容闳却没有接受太平天国的印绶。在回上海的途中，容闳根据所见所闻，对太平军的起源、性质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在他看来，“革命之在中国，固数见不鲜。闻者疑吾言乎，则试一翻中国历史，其所谓二十四朝，非即二十四次革命写真耶？顾虽如此，战国而外，中国之所谓革命，类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二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亦无英雄豪杰，创立不世伟业，以增历史精神。太平军战争之起，则视中国前此鼎革，有特异之点，非谓彼果英雄豪杰，以含有宗教性质耳。”容闳认为，正是这种宗教性质，使得太平军能够迅速壮大，并成燎原之势。但是，他同时看到，洪秀全在举事之前，曾“醉心科举之虚荣”，是因为屡试不第，才有了聚众革命的念头。而他的所谓拜上帝会，又是“以拜上帝之事，蹈狐鸣篝火之嫌”，而在革命兴起之后，“由其所招抚，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盖此等无赖之尤，既无军人纪律，复无宗教信仰，即使齐之以刑，不足禁其抢掠杀人之过恶。”^①所以，这样的革命，即使胜利，也只是政权的更迭，文明仍是旧的文明，社会仍是旧的社会，人的命运也依然如故。南京的实际状况告诉容闳，那不是他的理想。

幸运的是，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终于颇有名气。

1863年，机会终于到来。这年2月，容闳的朋友、曾国藩的幕僚张斯佳写信给容闳，转达曾国藩很想见他的意思，请他到安庆去。因为容闳曾到太平天国考察过，与其首领有来往，所以对曾国藩的邀请心存疑虑，所以没有动身。两个月后，容闳又连续接到了张氏和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的信，说明了邀请他去安庆的目的，催促他立即动身去见曾国藩。

容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实现自己教育计划的良机。于是在这年9月，容闳来到安庆。此时的曾国藩正计划在中国建立一座西洋机械厂，需要容闳帮办洋务。容闳关心的是派留学生，但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必须先做另外的事。容闳答应到美国采购机器，这年10月从上海出发，次年春天到了纽约。虽然他直到

① 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9—80页。



1865年才完成任务回国,但还是被认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仅成了正五品的候补官员,而且赢得了曾国藩的信任。正是后一点,为他实现自己的计划创造了条件。1870年天津发生教案,曾国藩奉调直隶总督,与丁日昌等人负责处理教案。容闳借机提出了他的教育计划,立即得到了曾国藩、丁日昌等人的一致赞同。他们与李鸿章联名上奏,并且迅速得到了批准。

前后奋斗16年,容闳的理想终于要变成现实。朝廷决定:招收10~16岁幼童120名,从1872年开始,每年30名,分四批派往美国学习,时间15年。为了做好这件事,朝廷在上海专门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美国成立留学生事务所。陈兰彬任留美事务所监督,容闳被任命为副监督。

用今天的目光看,官费留学,应是极好的机会。但让容闳没有想到的是,情况竟与他当年跟随布朗博士出国时同学们报名的情况一样,生源奇缺,很少有人报名。原因很简单:美国是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并且野蛮而不开化,让人望而生畏。在当时的中国,对于海外,对于洋人,有种种妖魔化的传说。除了洋人会把孩子的皮剥下换上狗皮之外,还会把孩子拿去做各种实验。鲁迅曾写到他的故乡当年的情形:“我幼小时候,在S城……常常旁听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曾有一个女人,原在洋鬼子家里佣工,后来出来了,据说她所以出来的原因,就因为亲见一坛盐渍的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快要和坛沿齐平了……然而洋鬼子是吃腌眼睛来代腌菜的么?是不然,据说是应用的。一,用于电线,这是根据别一个乡下人的话,如何用法,他没有谈,但云用于电线罢了;至于电线的用意,他却说过,就是每年加添铁丝,将来鬼兵到时,使中国人无处逃走。二,用于照相,则道理分明,不必多赘,因为我们只要和别人对立,他的瞳子里一定有我的一个小照相的……”^①

更让百姓难以接受的是,把十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家长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官府做事传统。所以,容闳使出全身解数,还是招不到这30名幼童,最后不得不返回离租界很近的老家,去动员乡亲们报名,才凑够了30名。1872年8月,这批留美幼童由上海启程赴美,中国的公派留学由此开始。

就在首批幼童出国的第二年,即1873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即奏请派遣学生赴欧学习。由于次年发生了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此事被搁置下来,但紧接而来的“海防大筹议”却使建设海军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个背景下,沈葆楨与李鸿章再次上奏,终于获得批准,以福建船政学堂学生为主,赴英、法等国学习。

严复搭上的正是这趟车。

^①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81—182页。

三、知遇郭嵩焘

在伦敦，严复结识了驻英公使郭嵩焘，并且得其青睐，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

那时候，科举出身的人都有所谓“恩师”，也就是录取他们的那位主考官。严复与科举无缘，所以没有这样的恩师。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的一生中，堪称导师的，只有郭嵩焘。正是郭嵩焘以自己的思想影响了严复。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长沙府湘阴县人。幼年从父读书，11岁入湘阴仰高书院，18岁入长沙岳麓书院，曾与曾国藩义结金兰，但他与曾国藩等人不同，有见识和才华，却并不急于建功立业。用曾国藩的话说，是“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

说起郭嵩焘，人们往往说他仕途坎坷。但考其实际，应该算是比较顺利的：1837年，他20岁考中举人，这个年龄亦算少年得志；其后两次会试都名落孙山，因而以游幕寻找出路，在当时也算正常；1847年考中进士，这一年他30岁，正式步入仕途也不算晚。可惜的是，郭嵩焘的双亲去世，按照当年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在这期间，郭嵩焘参与了平定“发捻之乱”，是他激发了曾国藩的雄心，然后又促成了避居山中的左宗棠出山与曾联手。而且，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在军事上，他还能统兵作战，有筹建水师之功；在经济上，他推行“厘捐”、“盐捐”、“劝捐”，被誉为“湘军财神”；在文字上，他更是一流的，当时湘军集团的许多文件都出自他的手笔。

他所表现出的才能终于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856年，他应召进京做了翰林院编修。郭嵩焘是幸运的，他得到了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由于肃顺的推举，他又被数次召见，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咸丰帝命他进入南书房，明言不用他操心笔墨之事，而是要他“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他是被皇帝当作帅才培养的。这一年郭嵩焘39岁，正是一个人干事业的时候。

1858年，咸丰皇帝派他到天津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这本来是让他去锻炼一下，可是，他却与僧格林沁由矛盾而生积怨。他的想法与僧格林沁总是格格不入，他又不肯顺从。最后，终于因用人失误而被抓住把柄，降职三级，仍回南书房行走。皇帝对他仍然不错，但他自己觉得没意思，以病为由辞职还乡了。

赋闲两年，他应李鸿章之邀再度出山，1862年出任苏松粮道，后又升任两淮盐运使。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焘在两淮理财顺利。1863年秋，他又升任广东巡抚，有了一个三品顶戴。郭嵩焘在广东的政绩乏善可陈，但在这个洋务繁剧的省份任职，却对西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开始了新的思考。可惜的是，在任职期间，他与前后两任两广总督矛盾重重，最后不得不再次归乡。



隐居。这次赋闲长达八年之久。

1875年初,闲居的郭嵩焘又被想了起来,奉诏进京,并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却没有到任,改在总理衙门行走。就在这时,云南边境发生了英国教士马嘉理被杀的事。这事件影响了郭嵩焘晚年的命运。

在此之前,大清帝国没有外交。今天的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而当年的清帝国无外交却不是因为弱,而是因为自我感觉中的强大。这是古老帝国的传统:外国人来,必然是朝贡、受封或领赏的,作为处于世界中心的天朝大国,如果与各国平等交往,岂不乱了礼法?所以,在此之前,尽管西方列强一再要求与大清帝国建立外交关系,结果还是被拒绝了。“马嘉理案”发生后,情况不同了。朝廷自知理屈,不知该如何应对,手足无措,便答应了英国的种种要求。这要求之一就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自此开始,它是被迫的,“屈辱”的。而第一个承受这“屈辱”使命的就是郭嵩焘。

当时,大清朝野都不清楚驻外大使所担负的使命,满腹经纶的大臣们也只能按照中国传统进行理解,他们见过属国派来的使臣,那是要下跪的,皇帝居高临下,对他们褒奖、安慰或训斥,他们都只能俯首称是。他们更清楚战国时期各国之间互派王子做人质,洋人要求派常驻大使,是否与此有些相似?在人们的观念中,外国都是蛮夷之邦,定期来朝贡是可以的,但决无朝廷派人驻外之理。从鸦片战争开始,虽然屡屡战败,但这种观念并未改变。朝廷上下都认为,接受外国使节驻在京城已是极大的宽容和让步,再派大员到外国常驻,简直是奇耻大辱。

仔细想来,这并不奇怪。因为互派大使的确意味着“天朝上国”地位的改变,意味着清帝国与“夷狄”成了平等关系,就不能居高临下地给英吉利或美利坚下“恩诏”了。如果那样,大清帝国的世界中心地位就崩溃了。当然,今天的人们都知道,清帝国从来就不是世界的中心,西方列强也从来不是清帝国的属国,但对从未有过与各国平等交往经验的清帝国来说,却建构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想象,形成了一种“清帝国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不同的是,清帝国不仅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西方事物,而且把自我想象当成了现实,所以总是不能放下架子。所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条约中,为咸丰皇帝和王公大臣们最为痛心疾首的不是割地赔款,而是接受外国大使驻在京城。1858年,中英天津谈判,中方代表表示:皇帝宁可一战,决不接受外国使馆。但英国代表说:与其让北京挤满外国军队,不如让大使驻在北京。咸丰皇帝反复权衡,最后才勉强同意,批准了《天津条约》。但允许外国使馆驻京的消息传来,朝廷一片痛苦和愤怒之声,大臣们认为,“岂有贡使不走之理?”面对众议,咸丰皇帝表示:外国公使在北京只准暂住,“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眷属”。如果英、法两国以条约为依据,坚持让公使常驻北京,则“必须更易中国衣冠”。为此,咸丰皇帝要求改变部